

张明发 巨海林 编著

养蚕

与蚕病防治技术

YANGCAN YU
CANBING FANGZHI JISHU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养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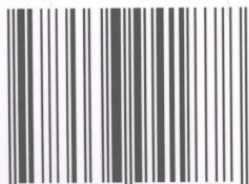
YANGCAN YU
CANBING FANGZHI JISHU

与蚕病防治技术

责任编辑 张 莹

封面设计 刘 伟

ISBN 7-5369-4187-0



9 787536 941878 >

ISBN 7-5369-4187-0/S • 408

定价：16.00元

养蚕与蚕病防治技术

主编 张明发 巨海林
参编 牛虹 李五建 郭昶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养蚕与蚕病防治技术/张明发,巨海林编著. —西安: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6.7

ISBN 7-5369-4187-0

I. 养... II. ①张...②巨... III. ①养蚕—技术
②蚕病—防治 IV. S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1326 号

-
- 出版者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邮编 710003
电话(029)87211894 传真(029)87218236
<http://www.snstp.com>
- 发行者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电话(029)87212206 87260001
- 印刷 陕西地质印刷厂
- 规格 850mm×1168mm 32 开本
- 印张 5.5
- 字数 138 千字
- 版次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 定价 16.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我国是世界蚕业的发祥地，曾为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出过重大贡献。栽桑、养蚕、缫丝、织绸在我国已有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据史料记载：在无文字记载以前，黄河流域就开始了蚕业生产活动，陕西地处黄河流域中游，亦是我国蚕丝业发祥地之一，早在西周初期，关中民间已有栽桑养蚕的生产活动。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世界蚕丝业发展中心移向中国。丝绸是当今世界“回归自然”热中最为理想的衣着原料。而近几年我国蚕业生产又在“东桑西移”，这是陕西乃至西部各省（区）发展蚕业生产的一个大好机遇。陕西省具有发展蚕桑生产的优越的地理和气候条件，有比较配套的科教力量、生产规模、加工能力和商贸机制，是我国目前“南蚕北移”的最为理想的落地地之一。尤其是秦巴山区的安康、汉中，商洛地区的蚕丝业生产已成为一项传统的产业。它是农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优选项目之一。在农村实施“稳粮增收奔小康”的奋斗目标中，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增加经济效益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蚕农形象地比喻：“种粮饱肚子，养蚕挣票子”，“坐蚕桑车，走小康路。”

陕西省发展蚕业生产的潜力巨大，从秦巴山区的汉江之滨，到陕北的长城脚下，渭北的黄土高原、渭水流域的八百里秦川的广大土地上，从古到今都有发展蚕丝业生产的足迹。勤劳的秦人在漫长的蚕业生产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尤其在近期的发展过程中掌握了大量的现代科学知识，对推动陕西省蚕丝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目前全省已有 55 个县（市），30 多万农户投入这项产业。2005 年全省桑园总面积 8.2 万公顷，投产面积 4.7 万公顷；全年发蚕种量 58.68 万张，产茧 20272 吨，是历史上最好时期。

忆历史成就辉煌,展未来历程漫长,功劳簿上不骄傲,奋斗道上不气馁。认真回味总结所走历程中的经验教训,“巩固提高陕南、积极开发陕北、适度发展关中”,这是多年来陕西蚕业生产发展中总结的一条成熟经验。充分利用国家退耕还林政策,营造生态桑园,把叶用桑和果用桑的栽植在一定比例中同时发展。在集中产区着力培育“一村一品”、“一乡(镇)一业”的区域性主导产业,发展一批优质蚕茧基地县。

引导蚕农正确认识蚕业生产发展波浪式前进的规律。如在低潮时挖桑转产,而高潮时再栽桑,走“低挖高栽”之路,几起几落终难成功;只有在低潮时持续发展或坚持营桑,培训技术,为迎接高潮的到来而养精蓄锐,走“低培育高受益”之可持续发展道路,才是一条成功之道。

蚕丝业生产是一项环环紧扣的系统工程,而陕西省仍然是茧、丝、绸、农、工、贸分割管理,体制不畅,这是长期以来影响蚕业发展的瓶颈,很难实现行业内部各环节之间优势互补,发挥整体效益,反而造成部门之间力量相互抵消,阻碍蚕业系统整体发展。目前急需建立一个调动各方积极性以形成合力,提高蚕丝业整体效益的权威经营管理机制,突破瓶颈限制,把陕西省的蚕丝业生产引上快车道,使之迅猛发展。

陕西省园艺蚕桑技术工作站的几位同志,正是处于上述目的和对工作的热忱,积累多年来丰富的实践经验,紧密结合实际,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编著了《养蚕与蚕病防治技术》一书。这是一本理论结合实际、体现区域特色的好书。其内容全面翔实、切合实际;其形式图文并茂、深入浅出,一学就懂。可供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基层蚕业科技人员和蚕农阅读,是广大蚕业生产者的良师益友。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蚕桑丝绸研究所研究员 罗玉功

2006年3月于周至

前 言

陕西省蚕业生产历史悠久，在漫长的生产实践和科技交流中，从清代乾隆年间开始，就不断有专业论著问世。出生在秦岭以北、渭水之阳的兴平桑镇的相岫（1687—1785），一生致力于钻研自然科学知识，在家乡倡导农桑事业，并亲身实践，深究栽桑养蚕科技，积 13 年之经验，在乾隆五年（1740）著成《豳风广义》和（1756）《蚕政摘要》两部农业科技专著，传递至今仍有一定的科技参考价值；相继西北农学院姚沃教授分别于 1918 年编著《蚕种诂论》，1937 年《蚕学》、1943 年《养蚕学》、《栽桑学》；陕西省蚕桑研究所诞生后，1965 年姚沃教授又编著了《怎样养蓖麻蚕》，1973 年夏耀同志编著了《柞蚕良种繁育》，1995 年李晚忱博士、肖小平同志编著了《北方栽桑养蚕》，1999 年罗玉功研究员等编著了《陕西家蚕品种志》，2001 年钟勇玉研究员、薛三勋等编著了《北方蚕桑产业化开发实用技术》，2005 年薛三勋等编著了《蚕桑养殖技术》等，这些科技著作的出版，标志着陕西蚕业科技事业的飞跃发展。

陕西省园艺蚕桑技术工作站的几位同志积多年的实践知识和工作经验编著了《养蚕与蚕病防治技术》一书。这本书的第一章简要叙述了陕西蚕业生产的简史，让人们了解陕西蚕业生产的历程，了解为开发陕西蚕业科技很多有识之士千里迢迢外出学习或从祖国南方奔向大西北奉献终生的事迹。早在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陕籍岚皋县漳河坪人陈可庄，东渡日本东亚蚕业学校学艺。姚沃教授 1912—1918 年和 1924—1925 年两次留学日本，回国后从贵州祖籍于 1938 年到西北农学院任教。书中二至九章较为系统地讲述了养蚕防病技术，其内容吸纳了一些现阶段创新型

技术，如塑料大棚养蚕技术等。第十章“蚕业经营与管理与技术推广”，填补了国内科普资料的空白，其内容涉及广泛，对蚕业经营管理中的主要特征、形式、方法等问题作了简单的介绍，这也是蚕业界长期忽视的问题，其目的是帮助读者解决一些认识和方法上的问题，以提高工作效率。关于蚕业技术推广问题，在一般情况下人们都认为是个很简单而老生常谈的问题，有心人只要细细思考一下，其实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要把这项工作真正做好，并不容易，它包含着知识领域、思想方法、工作方法、认识水准、信息容量等一系列的重要内容。尤其在全面落实贯彻科学发展观和打造科技创新型国家的现阶段，做好科技推广工作更具现实意义。

本书编著过程中，得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蚕桑丝绸研究所研究员罗玉功的鼎力支持，并作序，使得这一工作顺利完成，在此深表感谢。

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所限，书中漏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赐教。

编著者

2006年5月于西安

目 录

第一章 陕西蚕桑生产发展简史	1
第二章 家蚕的生活史	10
第三章 蚕与环境	13
第一节 小气候环境	13
第二节 营养环境	16
第四章 养蚕前的准备	19
第一节 蚕室及附属设施的标准与要求	19
第二节 养蚕前消毒	21
第五章 小蚕饲养技术	30
第一节 催青及收蚁	30
第二节 小蚕饲育技术	37
第六章 小蚕共育	47
第一节 小蚕共育的发展概况及特点	47
第二节 小蚕共育形式	49
第三节 小蚕共育室的结构	52
第七章 大蚕饲育技术	58
第一节 大蚕饲育技术	58
第二节 上蔟和采茧	69
第三节 塑料大棚省力化养蚕技术	76
第四节 纸板方格蔟及使用技术	83
第八章 鲜茧的分类与评级标准	90
第一节 鲜茧的分类	90
第二节 鲜茧评级标准及方法	92
第九章 蚕病防治技术	100

第一节	蚕病分类	100
第二节	蚕病的外观识别	102
第三节	病毒病	105
第四节	细菌病	111
第五节	真菌病	117
第六节	微粒子病	120
第七节	动物寄生病	125
第八节	中毒症	128
第九节	蚕病的综合防治	135
第十章	蚕业经营管理与技术推广	139
第一节	蚕业经营管理	139
第二节	蚕业技术推广	144
附录		150
附录 1	蚕桑生产实用基本参数	150
附录 2	介绍三种漂白粉有效氯测定方法	152
附表		154
附表 1	家蚕生理摄氏、华氏度对照表	154
附表 2	相对湿度查对表 (摄氏)	155
附表 3	相对湿度查对表 (华氏)	156
参考文献		157

第一章 陕西蚕桑生产发展简史

陕西是我国蚕桑生产发源地之一，传说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命元妃嫫祖“为宝养蚕”，“煮茧绎丝”。20世纪50年代中期发掘的西安半坡村遗址，是6000年前原始社会后期母系时代原始人聚集、生活居住时间较长的地方。出土的陶器残片上有“纹痕细如丝”的线纹、橘状石纺轮以及2~4厘米长的骨针等物。说明当时的先民们，已有采集、利用野蚕茧的技能。这些史料说明，在无文字记载以前，黄河流域就已经开始了蚕业生产活动。

西安半坡村地处关中平原腹地，是黄河流域中游最得天时地利的宝地，是周代祖先的发迹地。西周初期关中民间就有栽桑养蚕活动。《诗经》中多处有描述农耕蚕织的诗句。秦始皇陵中，有30多箱“金蚕”陪葬墓地。考古出土文物中，在岐山、扶风交界处的何家村，发现3000年以前已有“玉蚕”和丝绸织物。1986年在石泉县前池乡谭家湾出土的一枚“鎏金蚕”，惟妙惟肖地刻画出熟蚕扬头吐丝的逼真神态，系前汉时期文物（现陈列在陕西省博物馆）。

东周末期，诸侯相互争斗，关中蚕桑破坏殆尽。西汉初期，“父帝躬耕，景后亲蚕，励精图治，一意农桑”，于是“耕桑者益多”。京都长皇宫中有东、西织室，每年耗资5000万两，以关中的茧丝为皇室织造高级缙帛。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城固县人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以长安为起点、贯通西北、直达西亚的“丝绸之路”，传播了东西方的文化和农业技术。汉成帝时议郎记胜元在关中督劝农桑，并创造了无性繁殖桑苗插条法和“上蚕法”，整个秦川地区成为蚕桑盛地，蚕桑生产达到鼎盛时期。三国时期，安康月河流域桑麻生产已闻名遐迩，孟达给诸葛

亮的书信中盛赞月河川道“黄北土沃衍，而桑麻列植”。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先后有 13 个王朝在西安建都，西安是我国六大古都之一。唐代，京都长安是当时中国最大的蚕丝织品集散地，云集京都的外商学士有十万余人。丝绸之路有了进一步发展，每年大量的丝、绸、绫、绢、帛等源源不断地输往中亚细亚和欧洲等地，丝路沟通了欧亚文化，促进了陕西的蚕业发展。陕西的农村至今仍有许多以“桑”命名的乡村，如兴平县的桑镇，凤翔县的小桑园，周至县的桑堡，韩城市的桑树坪，子长县的桑台，宁强县的桑海，安康市的桑溪铺、贡桑铺，石泉县的丝艮坝，眉县的丝街等都是蚕桑生产发展中形成的。

到了宋代（960—1279），长安气候冬季更冷，兼之宋初棉花生产传入陕西，农业生产结构发生了变革，蚕桑生产南移，对黄河中游的蚕桑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宋代陕南仍有蚕桑生产。陆游的诗歌咏道：汉中盆地“平川沃野望不尽，麦陇青青桑郁郁”，描绘了汉中桑树遍野的景象。元代重兵革，轻农桑。明清两代复将“耕农艺，养蚕织绸”视为王政之本。明洪武二年（1369）石泉县令谭衍“劝课桑”。明成化十三年（1477）兴安（今安康）知州郑福以“省沃土，深民树桑棉艺菽粟”，因有政绩深得绅民赞颂。清代康熙乾隆年间，视兴桑养蚕为“富民之道，立国之本”。这一时期陕西蚕桑生产有了长足发展。康熙二十五年（1686），汉中知府滕天授“重农桑，以足食”，传授养蚕技艺，撰写了《劝民栽桑示并歌》，以便民告示印发各乡村，务求家喻户晓。而且制定了奖励政策，鼓励农民栽桑养蚕，汉中府的蚕桑事业得到了恢复。在雍正年间《陕西通志》中载“四境多桑，蠋（音象，即蚕）极半”。从乾隆至光绪末年，汉中蚕桑的发展在历史上达到鼎盛时期。1946 年中国地理研究所印的《汉中盆地考究报告》称：汉中蚕桑业清季最盛，又以城固、洋县桑树最多，制绢家数达 50 余，销畅远达甘肃、青海、新疆，洋县“马畅绢”久负盛名。乾隆年间，出生在秦岭之北、渭水之阳的

兴平桑镇的相岫（1687—1785），以教书为生，博学好问，致力于钻研自然科学知识，在家乡大力倡导农桑事业，并亲身实践，深究栽桑养蚕技术，积 13 年之经验，在乾隆五年（1740）著成《幽风广义》和（1756）《蚕政摘要》两部农业技术专著，前者现仍在民间留传。乾隆六年（1741）相氏将其著作和所缫水丝、织绢帛，一并呈验陕西当局，呼吁重振关中蚕业，引起陕西巡抚陈宏谋的赏识，将其“招之来省，设立蚕馆，发给工本，养蚕织缣”。乾隆十四年（1749）四月，陈宏谋在给朝廷奏疏中称：“陕西省幽岐、芄地，蚕桑之事，自昔之盛，日久渐替，查西同、凤汉、邠乾等州府，皆可养蚕，今令地方官身先倡率，广植桑树，雇人养蚕。并于省城置机、觅匠、织缣，此次进呈之缣，即系省城所织。民间知种桑养蚕均可获利，今年务桑者更多，计通增桑树已及数十万株。从此渐加推广，陕西省桑之利可以复兴。”相岫的努力与陈宏谋的倡导，对恢复关中的蚕桑业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嘉庆十三年（1808），兴安知府叶世倬将相岫的著作择其精华编纂为《蚕桑须知》刊印发行，并为之序说：“古人蚕桑之教起于西北，今则其利尽归东南，秦人知农不知桑，一遇旱潦则饥谨随之。不知蚕桑利信农，而其工且半于农。”叶氏又颁发《示兴郡绅民急宜桑树养蚕谕》，据理纠正兴郡不宜树桑养之说，并督促绅民“春令届，所有养蚕器具，急宜遵照前颁书图式购办。并预购蚕种，以备应用，切勿狐疑自误，有贪本府领欲遵圣论，谆谆为谋小民衣食本意”。汉阴厅通判钱鹤年遵府示，积极劝民兴桑养蚕，他发现当地乡民养蚕、取丝、织绸、作帛不得法，“成茧松而不实，取丝粗而色暗，丝绸不匀洁，作帛不能润厚”，“便从浙江带来蚕种，并延善于养蚕者来汉，教民兴桑、养蚕、取丝、织绢、作帛之法”。嘉庆十六年（1811），钱氏在其《广植桑谕》中说：饲养至三眠时，叶上微散石灰，则成茧紧密沉实，煮茧需用河水，釜中之茧不宜多煮亦不宜久煮，每丝根下茧数枚，取丝细亮，织绢光匀，作帛润厚。道光十五年至二十四年

(1835—1844)，浙东孝廉任紫阳、安康知县时勤政惜民、极重农桑，“刊《艺茹集》，劝民种植备荒，发《蚕桑示》教民树桑养蚕。”陈氏为《紫阳县志》作序说：“余之于紫阳也，劝种梅、劝种桑、劝种苕丝以为备织，至再至三”，因政绩卓著，去任时“民庶道留”并树“邑侯陈公去思碑”以资怀念。道光二十九年（1849）《石泉县志·人物志》记载：“饶丰人刘永泰之妻夏氏，其子文秀，邑庠生堂，令读《蚕桑须知》书，聚妇女而听之。”光绪二十二年（1896），兴安知府童兆容主持制订《蚕桑简要章程》，细述栽桑、养蚕、缫丝之法。清末安康、汉阴、石泉川道丘陵地区兴桑养蚕均有大的发展。光绪三十四年（1908）岚皋县漳河坪人陈可庄，东渡日本，在东亚蚕业学校学习，回国后，于1916年（民国五年）在岚皋县创办蚕业公社，兴桑养蚕，开办实业，曾在安康乙种蚕业学堂任教，后从医，建国后曾任陕西省政协文史馆员。宣统二年（1910）安康知县林杨光创办乙种蚕业学堂，开设有桑园、图书馆、蚕室、仪器供学生实习。

民国时期，1913年（民国二年）紫阳知县刘式金主持创办乙种蚕校，并资助该县汉王城人王雨漠赴日留学蚕桑。姚沃教授于1912—1918年和1924—1925年两次留学日本，先后在东京高等学校和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学习和研究蚕桑，回国后在贵州农校任蚕科主任，在河北农学院、北平大学任讲师、教授等职，1938年任西北农学院教授，主持创办西北农学院蚕桑试验室。姚教授从事农业教育和蚕桑科研工作，先后辗转9个地方，奔波22个单位，历时50余年。1918年编《蚕种论》，1937年和1943年分别著有《蚕学》、《养蚕学》、《栽桑学》三部著作。1958年陕西省成立蚕桑研究所，姚教授出任首届所长。1965年编著《怎样养蓖麻蚕》一书。在“文化大革命”中，姚教授被指控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蒙受冤屈，1969年因跌跤中风不幸去世，享年74岁。陕西蚕桑生产历史悠久，民国时期一度有所发展，1918年（民国七年）全省产茧量达到1.407万吨，当时居国内第3位。

1927年（民国十六年），陕西省当局将三秦公学农学科改为陕西省第一职业学校，设有纺织、农林、蚕桑3科。此后陕西蚕茧生产虽处于下跌趋势，但地处秦巴山区的安康地区，仍处于平稳发展势态，而且对于繁荣山区经济起了重要作用，安康、汉阴、石泉等县城，已相继成为茧丝交易市场。1924年（民国十三年）陕西省政府一份调查报告表明，当时安康县有湖桑、土桑160余公顷（8万余株），年产土丝11.5吨。1931年（民国二十年）安康全区产茧607.5吨，占全省产茧量的73.4%，为安康地区产茧量最高水平。尽管如此，仍未维持陕西产茧量的正常水平，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全省产茧量下跌到0.165万吨。抗日战争后期，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为维持其统治，内战不休，民不聊生，不仅极其残酷地剥削压迫农民，而且对工商业横征暴敛、倍加摧残。天灾不断，匪霸横行，交通闭塞，技艺落后，农、商、工业遭到极大破坏，蚕业生产随之急剧衰落。1949年陕西省桑园面积866.7公顷，产茧量仅为300吨。重点产区的安康地区仅有桑园733.3公顷，产茧量103.8吨，只占抗战前最高年产量的17.9%。

新中国成立后，陕西省的蚕茧生产，在蚕茧市场价格、科学技术滞后等因素的影响下，30多年来徘徊在0.5万至1万吨之间。20世纪50年代初期由江苏、浙江、四川等先进地区支持陕西蚕业科技发展调入一大批技术干部：王明达、张鑫泉、冯文福、韩元中、李焕文、张绍先、周志安、宋兆龙、胡司学、杨盛良、刘光盛、史克平、李裔寿、杭志良、罗福圣、龙永均、张家亨、吴引璜、汝玉瑛、张绍先、李广道等，六七十年代又有相继由大专院校分配到陕西的承经宇、陈筠、张成和、龙丽华、谢勇力、杨丽清、曾爱国、张蜀生、刘伦曾、黄心瑶、刘光明、陈肇华等一大批科技干部，分布在全省各地的蚕业技术、科研、教学单位，这些同志把一生精力奉献给了陕西蚕业科技，他（她）们中间有些同志是陕西蚕业科技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从此为陕西的

蚕桑生产带来了生机，桑园面积和产茧量由 1953 年 1600 公顷和 400 吨，增加到 1959 年的 3400 公顷和 1100 吨。1962 年，全省桑园面积减少到 1666.7 公顷，产茧量下跌到 450 吨。1963—1964 年继续下跌。经过调整，1965 年蚕桑生产开始恢复和发展。同时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安康、清涧、延安、宝鸡、汉中先后建起了蚕种场和缫丝厂。1966 年全省桑园面积达到 17793.3 公顷，蚕茧总产量 1400 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些地方把蚕桑生产视为资本主义倾向，要“挖根、刨桑、割尾巴”。宝鸡县的桑园被砍掉 2/3，安康县的桑园面积由 1965 年的 10406.7 公顷，下降到 8593.3 公顷，但产茧由 945 吨上升到 953.95 吨。到 1975 年全省桑园面积减少到 9866.7 公顷，比 1966 年减少了 8000 公顷。但由于当时采用了先进养蚕技术和引进了优良蚕种，蚕茧产量仍有所上升，全年产茧量达到 2000 吨，比 1966 年增产 600 吨。

从 1980 年起，农村养蚕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涌现了一大批养蚕专业户，当年陕西全省饲养蚕种 12.53 万张，产茧量达到 2851 吨。1981 年陕西省人民政府作出《关于加快发展蚕桑生产的决定》，采取各项政策和措施，鼓励农民大量栽桑养蚕，全省有蚕桑生产的县达 75 个，占 107 个县（市）的 70.7%。到 1982 年，全省桑园面积由 1980 年的 16466.7 公顷，增加 32733.7 公顷，产茧量增加到 4374 吨。1983 年关中的户县、三原部分地方一度出现了限产限购的做法，挫伤了部分农民养蚕的积极性，使部分农民挖桑改种其他作物。尽管如此，全省 10 个地（市）都有蚕桑生产，年产 5 吨蚕茧以上的县（市）按其产量大小分别是：500 吨以上的有安康、紫阳县，250 ~ 500 吨的有石泉、旬阳、汉阴、平利县，50 ~ 250 吨的有岚皋、宝鸡、镇安、略阳、户县、三原县，25 ~ 50 吨的有子长、西乡、汉中、延川、洋县，5 ~ 25 吨的有宁陕、子州、吴堡、蒲城、清涧、商县等。此后，各地在不断地扩建缫丝厂，先后在石泉、平利、紫阳、三原、千阳、略阳、安康、汉阴县（市）建起了缫丝厂，兴办地方产业，

扩大蚕茧生产的附加值。随着生产的发展，教育事业也有所发展，陕西省农业学校、安康农校，相继开设了蚕桑专业，为全省蚕丝业生产培养了一大批专业技术人才。目前陕西省有安康、石泉、汉阴、汉中、宝鸡、陕西省蚕桑丝绸研究所蚕种场 6 家种场，拥有年产普种 60 万 ~ 70 万张生产规模，可满足全省蚕茧生产的用种。1984 年关中一些县自筹资金，兴建起了 17 处收烘茧站，从此开辟了一条农口办茧站的途径，1985 年全省增加农口茧站 34 处，解决了部分地区农民“卖茧难”的问题。当年全省重点养蚕专业户共有 3.3 万户，桑园面积达到 46733.7 公顷，产茧量达到 4875.3 吨。全年生产 50 吨以上的县增加到 11 个县（市）。在地区分布上，陕南 3 个地区占全省产茧量的 90%，其中安康地区产茧量占全省 80%，安康县是全省产茧最集中的县，1972 年成为全省第一个年产 50 吨茧的县，1985 年全县人均 100 株桑，产茧量达到 151 吨，居全省各县（市）产茧之首。

经过一个时期的调整发展，陕西省蚕桑生产稳住了阵脚，从 1986 年起，进入了稳步发展的阶段，全省饲养蚕种 20.4 万张，产茧量达到 5276 吨。尔后，每年都呈直线递增。1991 年桑园面积恢复到 3866.7 公顷，全年养蚕 38.38 万张，产茧量突破 1 万吨。此后，更加快了发展步伐，1993 年全省桑园面积猛增到 53333.5 公顷，年养蚕 47.8 万张，产茧量跃到 1.4 万吨，经过 75 年的艰辛奋斗，全省的产茧量达到了历史上 1918 年（民国七年）1.407 万吨的最高水平。在改革开放的强劲东风鼓舞下，陕西省的茧、丝、绸生产的产业化步伐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有些县在茧、丝、绸，产、供、销一体化经营方面作了一些尝试，为全省茧丝绸行业体制改革积累了点滴经验。陕西省政府把蚕茧生产也列入主导产业发展，并提出了“依靠科技，大力发展，面向市场，优质高效”的 16 字重大方针。

蚕茧生产也不例外地受到市场经济的调节。1995 年由于厂丝价格下跌，全国茧丝绸市场疲软，影响到了陕西蚕丝业生产业的